《清史稿》编纂研究

张尔田与《清史稿》纂修*

张笑川

1914 年袁世凯政府批准国务院关于设馆纂修清史的呈文，设立清史馆。清史馆历经 14 年编纂，于 1927 年刊印《清史稿》行世。由于编纂的政治态度和仓促付印等先天的不足，《清史稿》自行世之后，一直受人诟病，并曾一度被国民政府封禁。但是《清史稿》对相关历史资料进行了汇集和排比，所据史料丰富，是研治清史的基本参考书，对其深入研究仍属必要。而且《清史稿》的纂修人员虽然立场保守，但其中并不乏严肃认真的史家，其撰著理念和方法，亦值得总结。目前国家正在启动新的清史编纂，《清史稿》的纂修经验与教训应作为必要的参考。

张尔田（1874—1945），原名采田，字孟劬，晚号遁堪，浙江钱塘县人。清末，曾任刑部广西司主事、苏州试用知府等职。民国建立后，以遗老自居，隐居上海，后入清史馆，并先后任教北京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光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燕京大学，著有《史微》、《玉溪生年谱会笺》、《遁堪文集》等，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①]张尔田作为清史馆的重要纂修人员，以之为例，深入研究，有助于对清史馆和《清史稿》的深入了解。

一、在清史馆的纂修活动

张尔田自 1914 年受聘入馆任纂修，期间于 1916 年左右因父丧返回上海，约于 1917 重新入馆，至 1923 年脱离史馆返沪，前后在馆将近十年。在此期间，他撰有《乐志》八卷、《刑法志》二卷、《地理志》江苏一卷、《图海、李之芳列传》一卷，皆为《清史稿》最终刊行时所采用。此外，他还与夏孙桐共同商定康熙朝大臣传目[②]，并在吴昌绶长编草稿的基础上撰《后妃传》，但未被采用，自编成单行本《清列朝后妃传稿》二卷行世。

清史馆因为管理不善，纂修人员有很多尸位素餐者，张尔田却非如此。王钟翰回忆：“据邓先生（邓之诚）告我：‘清史馆’开馆之初，凡经聘请为纂修、协修的人员必须每日入馆编书，张先生就按时入馆修书，而绝大多数的纂修、协修是很少每日按时入馆的。”[③]清史馆同僚陈敬第在《清列朝后妃传稿序》中也如是记载：“岁甲寅，清史馆开，余膺聘纂修，时吾邑张君孟劬亦以仲兄荐在馆。每食中入昳而归，见君伏案矻矻，日数百言不休。间或杂以谈谑，同辈交口以雅才推之。君所成书，乐志八卷、刑志二卷、地理志江苏一卷、图海李之芳列传一卷，咸谨严有义法。”足见张尔田在清史馆众多纂修者中是较为严肃认真的一位。

关于《清史稿》的资料来源和取材，冯尔康认为：“《清史稿》的取材，大体上来自两个途径，一是作者自行搜集资料，撰写成文；一是摘抄、综合前人成著，敷衍成文。它所以出的快，质量上问题多，与后一种方法的

[收稿日期] 2006 -4 -20
[作者简介] 张笑川（1970—），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州科技学院讲师；上海 200433

采用有很大的关系。”[④]关于列传部分，他认为，“《清史稿》移取其他著作和文献，在列传部分表现得相当明显。有一些列传是据《国史列传》、《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国朝先正事略》、《碑传集》、《耆献类征》加工而成。”[⑤]这段话给我们两条信息，一是《清史稿》的列传多是抄撮他书而成，二是所抄之书为《国史列传》、《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国朝先正事略》、《碑传集》、《耆献类征》等。我们可以顺此指点，查考张尔田的作品。

以《图海、李之芳列传》为例，笔者把它与《清国史》[⑥]的《图海列传》、《李之芳列传》对读，发现《图海、李之芳列传》中的“图海传”有很多重要史实为《图海列传》所无，而采自它书。如关于图海反对“撤藩”一事，即为国史原传所无而采自“实录”；图海“请发八旗家奴”征察哈尔一事，则采自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此二事都是有关一朝大政之事，尤其后一条记载，孟森在其《明清史讲义》中引用，以作为考查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重要史料。[⑦]从此也可以看出张尔田的高超史识。

另外笔者曾把《遁堪文集》[⑧]中的《图海、李之芳合传》与《清史稿》中的《图海、李之芳传》逐字比勘，发现二者略有异同，也许可以为修订《清史稿》和纂修新清史提供参考。现列举如下：

1、文集“图海以闻，上许之”，《清史稿》为“图海以闻上，上许之”；

2、文集“复潼关五塞”，《清史稿》为“复潼关五寨”；

3、文集“（子诺敏……）蒙古正黄旗都统”，《清史稿》为“正黄旗蒙古都统”；

4、文集“（周昌）寻复参蔡毓荣军事”，《清史稿》为“昌复参蔡毓荣军事”；

5、文集“（遣廷梅……）亦大破之”，《清史稿》为“又大破之”；

6、文集“（论曰……）逐收底川之绩”，《清史稿》在此句之后多“川军入滇，遂竟全功”。

关于张尔田所修《乐志》的价值，沈渭滨在讨论新清史纂修时说，“《清史稿·乐志》内容，除‘总论’述有清一代作乐制器的历史外，其余包括乐谱、乐器、歌辞、各种不同乐曲之配器等，均有价值，新修《清史》可以采用”[⑨]，予以充分肯定。

冯尔康在评价《清史稿》时说“《清史稿》的著者们从‘实录’、‘会典’、‘方略’、《国史列传》、各种档案文献私人著述中取材，选择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如张尔田（采田）为它写了《乐志》八卷，《刑法志》二卷，《地理志》江苏一卷，《图海、李之芳列传》一卷，均为广征博采之作。”[⑩]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二、《清列朝后妃传稿》

《清列朝后妃传稿》二卷，于1927年成书，1929年刊刻问世，绿樱花馆平氏墨版，线装二册，后有《清代传记丛刊》印本。

朱师辙《清史述闻》云：“纂修张尔田孟劬，又名采田，继缪筱老人顺康列传。与夏闰老同定康熙朝大臣传目，仅成图海李之芳传一卷，南旋。曾纂地理志江苏一卷，又纂后妃传、乐志，今史稿所刊，犹其初稿。”[⑪]这段记载有误。屈强《嘉兴金钱孙先生行状》云：“君（金兆蕃）任太祖、太宗两朝诸臣传，犹属建州部族，钩稽旧籍，三致意焉。又撰后妃列传，有清一代，以孝庄始，以孝钦终，宫壸之事，动关家国，益以妃嫔外戚，例无汉族，其家世、其封秩，纪载容有疏漏，君考核精详，语必有本。”[⑫]《清列朝后妃传稿》金梁跋中也说“《史稿》所刊为金钱孙兆蕃复辑，审慎简核，期与他传一律。”可知《清史稿·后妃传》乃金兆蕃所作，绝非张尔田原稿，否则其稿亦不必单印行世。

关于此书编纂经过，张尔田在前言中云：“甲寅秋，余以庸薄，膺聘纂言，每感前修，思宏绍勒。吴君伯宛，首创长编，以草相属，所采官私著籍、玉牒、实录、宫史，仅数十家，并信而足征，文直事核。”[⑬]陈敬第序云：“吴君伯宛修后妃传，辑长编未半，举以属君。既削稿，复增吴辑未备者十之三四，归而删定成今书。”[⑭]平毅“校写后记”云：“后妃传稿二卷，遁堪先生修史时所撰稿也。当时仁

和吴伯宛昌绶任辑长编，先生参以考证，然后加笔削焉。归来削稿者再，并仿宋王皓《唐余录》史例，博采诸家，附注下方，逾岁一周，稿始定。时闻伯宛讣音，先生感叹良友，兼以衰病，不复能再治，因命毅条缀排比，成此编。”[15]

从以上记述可知此书写作分为两个阶段。在清史馆中，先由吴昌绶编辑后妃传长编，张尔田加以增补、考证、删削，此书初成。1923年张尔田离馆南归后，进一步删修和增补，“博采诸家，附注下方”，增加了大量间注引文，历时一年，完成定稿，1929 年（民国 18年）由山阴平氏绿樱花馆墨板印行于世。此后，张尔田又对此书进行校勘、增补和修改，并似乎有意加附“校记”再版[16]，但此事似乎未成，因笔者至今并未见有此书其他版本行世。但从其《与邓文如先生书（论清列朝后妃传稿校记）》[17]一文可知，校补共计 68 条，其中改正 8 条，补充 60 条。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随时注意增补修改，这种严肃认真、对著述负责的精神，实在值得赞赏和表彰。邓之诚说他“自谓一生成就，或在此书。”[18]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

张尔田花大力气撰述此书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清代国史馆纂修的本纪、列传、志等很是完备，后人可以据此修著新史，唯有后妃传，国史馆没有修纂，因此爬疏史料，为之补齐，是很有意义的。另一个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大量有关清廷宫闱的各种传闻，作为一个史家，驳斥不经之说，还历史以本真，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冯尔康认为“该书重视史实，为研究清代后妃史的不可忽缺的史籍”，[19]不为过誉。

《清列朝后妃传稿》之所以受人重视，缘于以下特点：

1、严肃认真，史料丰富。此书征引材料极其丰富，据此书“前言”所列举，共有九十三种，另外还有《履霜录》、《崇陵传信录》两书，作者在书中虽对其说法进行驳斥，但因没有引用其记载，所以没有列入征引书目。从征引书目看，包括史部和集部两类，其中有清代官私修著的各类史书，如《东华录》、《碑传集》、“御制集”、“起居注”、“圣训”、“实录”，还有各类零散的历史资料，如内阁档案、“玉牒”、则例、文集、笔记等。而且此书不但详细记载后妃事迹，还详细记载了后宫的典章制度。如在书后附录《国朝宫史》的有关记载，使人们对清代历代帝王管理后宫的基本思想以及宫中岁用、乳母封号等有关事项有更系统地了解。正如冯尔康所说“这位严肃的史学家作了大量的搜集资料和整理工作”[20]，因此对于清代后妃事迹的研究者来说，这部书应该是首选的参考书。

2、考辨精详，严辟诬枉。清代历史由于时代较近，有很多野史流传，尤其是对于宫闱之事，各种野史杂记，更是着力渲染。张尔田在此书中，以严谨态度，对之一一考辨。

清代宫闱之事，后世传闻最多的是所谓“世祖出家”和“太后下嫁”两段公案。“太后下嫁”传说从张煌言《奇零草》之《建夷宫词》得来，此诗全文如下：“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张尔田经过考证指出诗中“太后”另有所指，与孝庄皇太后无关。其理由是，根据诗集钞本，此诗为顺治七年甲寅所作，而据《清实录》记载，是年正月丁卯，摄政王多尔衮追封其妃博尔济锦氏为正宫元妃，并于是月丁丑，纳肃亲王福金博尔济锦氏为妃。因此他认为，“摄政王以皇父纳妃继正宫，当时典礼隆重，民间或有‘太后’之称。”另外，顺治八年审讯刚林的记录、顺治十二年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的上疏以及议政王大臣对此疏的批示，都表明摄政王确实纳肃亲王福金博尔济锦氏为妃，而下嫁之说，则没有相关的记载。

关于“世祖出家”的传闻，张尔田认为陈其年《读史杂事诗》中的“玉柙珠襦连岁事，茂陵应长并头花”一句，可证顺治帝并未出家。另外韩菼所撰《王熙行状》记载其于顺治帝临死之前，奉命起草遗诏之事极为详尽，亦可证顺治帝并无出家之事。至于很多人引据的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他认为“宫监闲谈，诗人雅咏，瑶池黄竹之谣，苍梧白云之想，妙笔写来，疑是非是，是皆文章狡狯处。若以鸿都方士之寓言，解作西山老佛之信

史，梅村有知，宁不齿冷?”[21]这些考证都是很正确的，钱仲联《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笺》便详细引述张尔田的考证成果。[22]

关于慈安太后的死因，有所谓“食盒外进”，乃是慈禧派人毒死的传闻。他严辟这种传闻，说道“近代无实文人，最喜依托宫闱，增成其说，凡笔之书者，大都流言委琐，羌无故实，而尤莫甚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夫既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从何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经见？恽氏曾事东朝，横造影响无左验之言，吁可怪矣。先陵商臣之酷，见削于《唐书》；斧声烛影之疑，无闻于《宋史》。后之览者，宜深辟之”[23]。

从张尔田对以上三桩传闻的考辩与驳斥，可以看出其著史态度谨严，不务猎奇以增饰文章，传后人以信史的精神。当然，张尔田的有些考证也并非定论。如牟小东《清孝庄后下嫁之旁证》[24]一文，根据孝庄后陵寝在清东陵“风水墙”外，其灵柩曾浮厝“暂奉安殿”近四十年，以及慈宁宫曾被拆迁诸事，从而认定孝庄必有下嫁之事。

3、正文简洁、详列事注。《传稿》可分“正文”和“夹注”两大部分，正文极为简洁，不枝不蔓，同时夹注中则详列相关史料，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辩。这导致全书注解比正文多过数倍，成为本书编撰一大特点。郑天挺在介绍此书时说“行文很简略，注解却很详细，而且也很好”[25]，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本书在史料采择上的特点是，主要取材正史官书，对野史传闻取谨慎怀疑态度。《传稿》取法清毛奇龄《胜朝彤管拾遗记》很多，但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则判若霄壤，这使两书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关于两书的异同，邓之诚特予指出：“阅《西河合集》、《胜朝彤管拾遗记》，全采野记，殊无别择之力。张孟劬《列朝·后妃（传）》颇学其用笔，其改诏谕亦自毛先之。不与毛同者，唯专据官书，不信传闻。自以张为得，毛则纯乎小说，特笔致生动可喜，又张所望尘莫及者也。”[26]

4、具有史识。《清列朝后妃传稿》除记载得法之外，史识亦有可表彰之处。邓之诚认为《清列朝后妃传稿》：“孝钦临朝专制，一代兴亡所系，君备著其事，微辞示意，寄慨尤深。三复君书，而后知毛奇龄所作为短书琐语也。”[27]那么，我们就看看张尔田对慈禧的记载和评论。

笔者曾把《清列朝后妃传稿》与《清史稿·后妃传》有关慈禧太后的文字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对于慈禧太后重要事迹的记载，除互有详略之外，基本相同，但《传稿》中有些记载为《清史稿·后妃传》中所忽略。举例来说：

其一是关于颐和园修建之事，《传稿》中这样记载：“帝度清漪园旧址营建颐和园，为太后颐养祝厘所，又曾葺西苑。园苑者，穆宗亲政所经始，至是复营之，内藏不足假外贷，密讽各省海关效进。于昆明湖置‘捧日’、‘翔云’、‘恒春’小轮船，乐寿堂、瀛秀园设电灯，又于西苑创绮华馆，饬苏杭织造访能纺织人及蚕妇，杂致其中。禁内辟农畦树艺，曰‘如意庄’。”对慈禧晚年大兴宫苑，浪费国库的荒淫之举，可谓记载详细。其二是对于晚清新政的记载：“后自蒙变，毅然思与民更始，下诏以‘母子一心’示中外，又以懿旨戒妇女缠足，弛满汉通婚之禁。制作纷然屡载，而诸王浸以用事矣”，指出了清末新政导致宗室皇族掌权用事的效果。这些记载都是张尔田眼光独到的地方，体现了作者对于一代兴亡的关注和思索。

让我们再看看他对慈禧的评价。他在慈禧传后评论道“后临制凡四十七年，百僚仰成，外戚无假恩泽者。明达善知人，委左宗棠以西事，任李鸿章北洋，各尽其用……遭国多故，怵于变法，晚乃下立宪之诏”[28]。虽然作者的政治态度明显落后于时代，但是对于慈禧太后在清代政治中的贡献及其缺陷都有所涉及，这些都体现了当时清史研究的水平。在全传后的“论曰”中他这样评价：“同光之际，国统中否，孝钦代斫，独遏横溃。向使蹊田夺牛，不为已甚，宋之宣仁，曾何足云？将拯溺者不以规步为节，图大者不以小忍为詗乎？虽则政谢前良，犹愈禄去，公室纯耀，久而后渝，非不幸也。”[29]虽然作者主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评价慈禧，但是其中把慈禧太后和北宋宣仁太后相比较，对我们认识慈禧在清代政治中的作用还是有启发性的。

《清列朝后妃传稿》刊行后，普遍认为此书史料翔实，考证谨严，但也有人提出批评。一是认为此书隐讳“太后下嫁”之事，一是对晚清政变记载太略。对于前一批评，他认为“历史事实最重凭据，苟无真凭实据，而但信传闻之说，则史家未敢负其责，顾不如暂时缺疑之为愈矣。”再次重申了重视历史证据的严禁精神。对于后一个批评，他认为“孝钦一传，于当时秕政，何尝不掇载无遗，所以不及详述者，则后传体例宜然。”[30]亦言之有理，无可厚非。

《传稿》虽然离《清史稿》单行，但因创始于纂修《清史稿》期间，故可视作《清史稿》的副产品。类似的著作还很多，如吴昌绶《清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四考》、唐邦治《清皇室四谱》、朱孔彰《咸丰以来功臣别传》、金兆丰《清史大纲》等著作的形成，皆与作者参与《清史稿》纂修有莫大关系。因此，在总结清史馆和《清史稿》的成绩时，应联合以上“副产品”一并考察。

三 、其他清史著述

清史馆的设立和《清史稿》的纂修是近代史学史上的重要事迹，本身既有研究的价值。作为亲历其事者，张尔田较早注意及此。他曾在燕京大学作专题演讲，介绍《清史稿》纂修情况，由王钟翰辑录，以《清史稿纂修之经过》为名在《史学年报》上发表[31]，后收入朱师辙《清史述闻》中。他曾在《与大公报编者书》之三“论清史稿艺文志作法”中提及“近拟辑《兰台同征录》一书，尚未成”，此文当是其中一部分。

他还在一系列《与大公报副刊编者书》[32]中，对有关《清史稿》的讨论发表见解。如针对有人认为“《历志》及《乐志》中涉及推算技术之部分，皆成专科，亦宜删汰”[33]的意见作出了解释，认为以算学推定乐律是清乐的一大特色，所以《乐志》详推算部分是必要的，如此才能明了清乐与古乐的不同，“虽变例实正例也”。同时，他还以蠡舟《评朱师辙清史稿艺文志》一文为引，发表了对于修《清史·艺文志》的想法和见解，认为“此志体裁，本难尽善，而尤易舛误者。但据书名著录，而不悉其内容，则部居必致凌越”，并指出著录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这些记述和评论对后人研究《清史稿》纂修情况，是有参考价值的。

1928至1938年间，徐世昌组织人员编写《清儒学案》，张尔田亦受聘参加，为十位具体纂修者之一。但应聘三个月即因与某些编纂者不合而退出[34]，只为其著有《钱大昕学案》二卷。因体例所限，此文不可能完全体现张尔田的学识。但邓之诚仍认为“《钱大昕学案》二卷，君深明乐历，熟于辽、金、元三史，故于钱氏之学，发挥靡遗”。张尔田还曾草拟《清儒学案序》，未被采用。[35]此文曾发表于《学衡》，后收入《遁堪文集》。

此外，《孱守斋日记》一卷为作者三十五岁以前的学术札记，其中记录与夏曾佑等学者讨论学术的情况，是晚清学术史的重要史料。所作《清故学部左丞柯君墓志铭》、《先师章式之先生传》、《杨仁山居士别传》等碑传作品，传主皆为晚清民初学界、思想界重要人物，也是研究近代学术文化可资凭借的史料。

---

* 本文写作受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06SJB770003。

①关于张尔田的生平和学术活动，请参阅张克兰：《张尔田学术·师友叙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12月，第6期；张笑川：《张尔田及其史学》，南开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打印本。

② 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1957年，第55页。

③ 王钟翰：《清心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④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7页。

⑤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第57－58页。

⑥《清国史》，中华书局，1993年，据嘉业堂钞本影印。

⑦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2页。

⑧ 张尔田：《遁堪文集》，1948年刻本。

⑨ 沈渭滨：《清史编纂体例之我见》，《复旦学报》，

2003 年第 4 期，第 3 页。
⑩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第 57 页。
⑪朱师辙:《清史述闻》，第 55 页。
⑫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 年版。
⑬《清列朝后妃传稿》传首第一页，1929 年绿樱花馆平氏墨版，沈龙云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五种，台湾：文海出版社。
⑭《清列朝后妃传稿》传序，第一页。
⑮《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下，第一百二十页。
⑯见《张尔田致陈垣函》，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 407 页。
⑰载《史学年报》卷 2 第 4 期，1937 年 12 月。
⑱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燕京学报》第 30 期，1946 年 6 月。
⑲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66 页。另，方甦生《清列朝后妃传稿订补》（《辅仁学志》第 8 卷第 1 期，1939 年 6 月）亦认为“得此一篇，则清史稿后妃传可废也。”并把它与《清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四考》、《清皇室四谱》等书“后妃”部分比较，认为皆“未逮此传详明。”
⑳冯尔康《清史史料学》，第 57 页。
㉑关于《清凉山赞佛诗》，张尔田之外，缪荃荪、陈衍、孟森、陈垣以及钱仲联各有研究，见《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85 页。
㉒载《当代学者自选集 · 钱仲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
㉓《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下，第六十九页。
㉔载《学林漫步》第九集，中华书局，1984 年。
㉕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 年，第 391 页。
㉖邓之诚遗作，邓瑞整理：《五石斋文史札记》(八)，《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 年第 2 期，第 124 页。
㉗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
㉘《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下，第九十八页。
㉙《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下，第一百十七页。
㉚《与大公报副刊编者书》之四“论清列朝后妃传稿”，《学衡》第 71 期，1929 年 9 月。
㉛《史学年报》，1938 年 12 月，第 2 卷第 5 期，第 521—530 页。
㉜分别发表在《学衡》第 66、71、74 期。
㉝燕雏：《评清史稿》，《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十期，1928 年 5 月 21 日。
㉞过溪：《清儒学案纂辑记略》，载《艺林丛录》第七编，转引自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44 页。
㉟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第 344 页；另陈先生认为“尔田所拟本非精心，未能副一代学史之重，徐世昌并非以‘显宦不解读书者’，自然不会用它”。